

2026 年美伊戰爭與美國霸權的轉變：霸權穩定論的再檢驗

楊惟任*

摘要

本文以 2026 年 2 月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所引發的區域與全球效應為單一個案，檢驗霸權穩定論在當前國際體系的解釋力。本文以霸權穩定論為分析框架，輔以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與權力轉移理論，將理論命題操作化為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力及制度正當性四項指標。研究發現：美國仍保有軍事與制度性結構優勢，未出現可即時取代的多極格局；歐洲與印太盟友對美國採取有限追隨與戰略觀望，顯示霸權對盟友之約束力下降；中國與俄羅斯皆批評美國的軍事行動，但前者以不完全制衡為主，後者則訴諸象徵性制衡，均未形成集體硬制衡；戰爭雖強化美國對伊朗的直接壓力，卻也削弱荷姆茲海峽航運安全、國際制度正當性與核不擴散體制的可運作性。本文主張，2026 年美伊戰爭揭示的不是美國霸權的終結，而是「霸權延續但功能弱化」的修正型霸權穩定論格局，此發現對理解當前國際秩序之調整方向、同盟政治變化，以及制度正當性的修復問題，皆具有理論與政策意義。

關鍵詞：美伊戰爭、霸權穩定論、有限追隨、不完全制衡、國際秩序

*楊惟任，英國 University of Warwick 政治學暨國際關係博士，現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曾任世新大學國際事務長、公共事務長、共同課程委員會主任委員，研究專長包括政治學、國際事務、全球治理、人工智慧與社會科學，Email: william@mail.shu.edu.tw。

本文 2026/04/21 收到，2026/05/31 審查通過，同意刊登。

壹、前言

近年來，中東安全情勢趨於緊張。2023 年 10 月，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的突襲行動展開大規模軍事反制，之後，以色列又與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組織，以及活躍於敘利亞與伊拉克境內之武裝勢力陷入多線衝突，反映中東安全格局已由單一戰場向多點區域擴散。

2025 年 6 月，以色列採取預防性打擊戰略，對伊朗軍事與核設施實施多輪有限攻擊，伊朗也對以色列進行空襲。接著在 2026 年 2 月 28 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伊朗隨後對以色列與若干波斯灣國家施加報復，荷姆茲海峽航運亦受到嚴重干擾，影響國際能源供應和經濟局勢。縱然美伊雙方在巴基斯坦等第三方居間斡旋下展開停火談判，但衝突、談判、停火與封鎖反覆交替，形成高度不穩定的衝突型態。

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主要理由，在於削弱伊朗核子發展能力、壓縮彈道飛彈戰力，並切斷對黎巴嫩真主黨、哈瑪斯與胡塞組織之戰略援助，以維繫中東地區的秩序穩定。自從美國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又稱「伊核協議」)後，既有核治理機制逐步瓦解，伊朗不斷提升濃縮鈾純度與儲量，使核擴散風險攀升 (IAEA, 2024)。

美伊衝突期間，外溢效應在多個領域浮現。一方面，荷姆茲海峽運輸中斷與港口封鎖使全球能源市場、運價與保險成本同步上升；另一方面，衝突經由黎巴嫩、紅海與波斯灣等多個節點向外延伸，形成多點聯動的安全困境；再方面，主要大國與盟友對美國的支持程度出現明顯分歧，反映國際體系運作邏輯正在調整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d; Reuters, 2026f)。

冷戰結束後，美國憑藉絕對性的綜合實力確立單極體系的霸權地位，並以影響力為國際社會在制度與規範層面提供相對穩定的秩序架構 (Ikenberry, 2001; Krauthammer, 1990/1991)。然而，隨著中國崛起與俄羅斯重返大國競爭舞台，加以歐盟、日本與印度等行為者在科技、經濟與戰略的實力持續提升，全球權力分布逐漸呈現去中心化趨勢，單極體系之持久性受到質疑 (Mearsheimer, 2014; Waltz, 2000)。

2026 年美伊戰爭正是在此背景下，提供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經驗個案。儘管美國在軍事上仍具主導優勢，行動所獲得的國際支持卻相對有限。歐洲與印太地區多數盟友對美國就伊朗的軍事行動普遍抱持保留態度，部分盟友甚至明確拒絕配合美國的行動，至於中國與俄羅斯雖對美國加以批評，但實際制衡行動均未發展為集體硬制衡。這些現象顯示，美國霸權對盟友的動員能力及作為秩序供給者的正當性，均已面臨侵蝕。基此，當前國際體系究竟仍維持單極格局，抑或逐步朝向多極化方向演變，即構成本文之論述核心。

在上述邏輯下，本文從三個層次提出研究問題。就權力層次而言，本次戰爭是否已實質改變全球權力運作邏輯？結構現實主義強調權力分布對國際秩序具有決定性影響（Waltz, 1979），但權力優勢能否有效轉化為影響力，仍有賴經驗檢證。就行為層次而言，主要大國與盟友的回應模式，是否反映霸權約束力相對式微？如包宗和（2011）指出，當盟友對霸權的信任程度下降時，通常傾向採取避險或有限配合策略，Goh（2008）亦以「有限追隨」概念說明這現象。就制度層次而言，美伊戰爭是否已侵蝕國際制度的穩定功能？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有助於降低體系不確定性並促進國家間合作（Keohane, 1984），一旦主要強權選擇繞過既有制度，規範約束效果即可能顯著減弱（Krasner, 1983）。

本文以霸權穩定論作為中心理論，分析 2026 年美伊戰爭對國際體系的影響。霸權穩定論主張，國際秩序的維繫仰賴單一霸權國提供安全保障與集體公共財（Gilpin, 1987; Kindleberger, 1973），當霸權國具備足夠能力與維持秩序的政治意願時，國際體系較易維持穩定，反之則可能引發秩序鬆動，乃至於全面的權力重組。

不過，任何單一理論均難以完整描述國際互動的複雜性，因此本文引入結構現實主義作為對照性理論。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本質及權力分布的作用，並認為國家行為主要受相對實力所驅動（Waltz, 1979）。從該角度來看，即使美國仍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若權力轉化為影響力的能力下降，同樣可能推動國際體系由單極格局向更鬆散的多中心結構演進（Mearsheimer, 2014）。

自由制度主義提供另一補充性理論觀點，主張縱使霸權地位相對弱化，國際制度仍可能藉由規範內化與多邊合作機制延續穩定功能（Ikenberry, 2001;

Keohane, 1984)。本次戰爭是否導致制度功能的實質傷害，即構成評估國際秩序走向的重要觀察指標。

權力轉移理論亦具有相當的輔助解釋價值。當新興強權的綜合實力逐步逼近或挑戰既有霸權時，國際體系將步入較不穩定的階段(Organski & Kugler, 1980)。這見解有助於彰顯當前美伊衝突的深層意涵，影響不僅存在於區域安全層次，更涉及全球權力結構的動態重組。

根據前述，本文以霸權穩定論為分析框架，並藉助多元理論的交叉參照，從四項操作指標進行實證檢驗，包括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力及制度正當性。此設計有助於更精確評估 2026 年美伊戰爭對國際體系造成的衝擊。

本文採單一個案之理論檢驗設計 (single-case, theory-testing)，以 2026 年美伊戰爭為分析對象，檢驗霸權穩定論的實際解釋效力，並輔以文獻分析方法，整合理論論述與實證研究成果。此外，本文設計一個動態因果分析架構：「霸權行動→他國回應→制度與市場後果→體系穩定性回饋」，以檢視美伊戰爭對國際秩序運作的影響，並評估是否為國際體系由單極穩定轉向多中心競逐的契機。

值得一提，本文採理論檢驗式的單一個案設計，其旨並非預測美伊衝突的最終結局，而在檢視既有理論在特定情境下的解釋邊界。就方法論而言，單一個案於理論評估的價值，並不取決於事件是否已經落幕，而是取決於特定個案能否構成足以對理論命題形成檢證壓力的觀察情境 (George & Bennett, 2005; Gerring, 2007)。

霸權穩定論的核心預期，亦即霸權能否將軍事優勢轉化為盟友跟隨、對手退卻及制度背書，本屬可於衝突進行期間直接觀察的行為與過程層次現象，而盟友的官方聲明、安全理事會決議、國際組織表態及能源市場反應等，皆為已公開且可查證之一手素材，足以支持過程取向 (process-oriented) 的因果推論。

鑒此，本文所提出者，係一組附帶範圍條件 (scope conditions)，屬於一種允許修正的中期評估，而非對戰爭終局的論斷，至於其外部效度，仍待後續與其他危機個案進行系統化的比較後，方能得到更進一層的確立 (Lijphart, 1971)。

圖 1

美伊戰爭影響國際體系穩定的動態因果分析架構

霸權行動	→	他國回應	→	制度與市場後果	→	體系穩定性回饋
美國對伊朗之軍事打擊／施壓		伊朗反制、代理人擴散、盟友分歧、大國調整立場		規範約束弱化、制度協調受阻、能源與航運震盪		單極穩定性下滑、多中心競逐趨勢上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文獻探討

一、霸權穩定論的介紹

霸權穩定論最早由 Kindleberger (1973) 提出，理論動機係為解釋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崩潰的根源。他主張國際體系的穩定有賴霸權承擔公共財的供給責任，涵蓋範圍包括維繫市場開放、金融流動性與安全保障。當霸權具備充分能力且願意提供上述公共財時，國際合作較易維持；反之，體系秩序便面臨崩解風險。

Gilpin (1987) 在此基礎延伸，將霸權穩定論轉化為政治經濟分析框架。他認為，國際體系穩定是由特定權力結構支撐的政治安排，霸權國透過主導制度設計與規則制定，使自身利益得以嵌入體系運作機制，並壓縮其他國家的違規誘因。Gilpin 的論點與 Ikenberry 的「制度性霸權」相互呼應。Ikenberry (2001) 指出，美國在二戰後以布列敦森林體系與安全同盟的制度建構，實現權力延伸，並藉此鞏固領導的正當性與可持續性。

在安全面向，霸權穩定論與現實主義理論在邏輯上趨於一致。Waltz (1979) 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質迫使國家依賴自助法則，體系穩定取決於權力分布結構。Krauthammer (1990/1991) 以「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 描述冷戰後美國的強大地位，論證單一霸權對抑制大國競爭、維繫體系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此說法隱含的假設是：權力集中有助於提高國際體系穩定，並降低大規模衝突風險。

就理論而言，傳統霸權穩定論凸顯三項相互強化的機制：其一，霸權負責供給公共財；其二，霸權經由制度設計降低交易成本；其三，霸權憑藉絕對優勢的實力遏制挑戰者興起。這框架長期主導學界對戰後國際秩序的詮釋，並被廣泛應用於分析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Ikenberry, 2018)。

然而，冷戰結束後，全球權力格局歷經深度重組，促使學界對傳統霸權穩定論提出修正。

首先，霸權能力與供給意願之間的落差，成為理論修正的起點。Gilpin(1987)認為，霸權衰退的根本原因在於「相對收益遞減」與「維持成本持續攀升」的矛盾。當維持秩序的代價超過霸權的期望收益時，霸權即可能縮減對外承諾，秩序供給功能因此被削弱。

次，過度擴張問題成為批判焦點。Mearsheimer(2014)從攻勢現實主義出發，認為霸權在追求安全極大化的過程，往往採取擴張性外交政策，反而激化對手之制衡反應，最終適得反地降低國際體系穩定。論點說明霸權行動本身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秩序的提供者，也可能成為體系動盪的源頭。

再者，制度主義學者指出霸權與制度之間的矛盾。Keohane(1984)主張，即便霸權相對衰退，既有制度仍可能持續維繫合作；但若霸權主動繞過或規避制度，即會侵蝕制度規範功能。Krasner(1983)亦強調，國際制度的穩定性與霸權的遵守程度密不可分，倘若霸權率先違反制度規範，制度合法性便會遭到削弱。

在正當性方面，Clark(2005)另提出重要補充：霸權領導的延續並非僅取決於物質能力的絕對優勢，若缺乏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便難以維繫穩定的長期領導。即便軍事實力具有壓倒性優勢，一旦霸權行動被認為欠缺正當性，領導地位的可持續性將受到質疑。

國內學界對此亦提出若干看法。施正鋒(2021)指出，國際秩序之穩定有賴霸權運作與制度設計的良性互動，否則可能引發秩序失衡；包宗和(2011)認為，美國霸權雖仍處於相對優勢地位，但它的實質影響力已呈現下降的趨勢；吳玉山(2017)援引權力轉移理論，強調新興強權之崛起將加劇國際體系的不穩定。

綜上所述，當代霸權穩定論已超越「霸權＝穩定」的線性命題，轉而探討霸權有效運作的條件與限制，涵蓋成本負擔機制、制度依附程度與正當性基礎的消長。這理論轉向，為分析當前全球權力格局之演變，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解釋架構。

在上述修正後的脈絡下，學界對「單極體系是否穩定、霸權是否必然誘發制衡」的判斷，存在明顯的分歧，而此一分歧恰為檢驗本文個案的關鍵理論座標。第一個學派是為「單極穩定論」，以 Wohlforth(1999)以及 Brooks 與 Wohlforth

(2008) 為代表，主張美國的綜合實力遙遙領先，制衡所需的成本與協調障礙過高，故冷戰結束後並未出現實質的反美制衡，單極格局因而具有相當的耐久性。第二個學派則為「單極短暫論」，Layne (1993) 援引結構現實主義，斷言權力高度集中終將誘發新興強權的崛起與制衡回應，單極只是過渡性的時刻或過程。兩個學派雖同屬現實主義，對「權力優勢能否自動轉化為穩定領導」的判斷卻南轅北轍。

介於兩者之間的是關於制衡形態的辯論。Pape (2005) 與 Paul (2005) 提出「軟制衡」(soft balancing) 概念，主張次級強權雖然無力遂行傳統的硬制衡，仍會運用國際制度、外交協調及經濟工具，延滯並削弱霸權的單邊行動。惟，Brooks 與 Wohlforth (2005) 以及 Lieber 與 Alexander (2005) 質疑軟制衡的概念效度，認為相關行為可由一般的利益折衝予以解釋，未必構成針對霸權的制衡。Schweller 與 Pu (2011) 亦指出，在單極結構下，制衡本質上屬於修正現狀的行為，新興強權向來先以「去正當化」(delegitimation) 策略削弱霸權的權威，再逐步累積全面制衡的條件。

上述爭辯為本文提供清晰的比較判準：倘若盟友普遍追隨、對手按兵不動，則單極穩定論獲得支持；若是出現集體硬制衡，單極短暫論獲得印證，如果僅見制度性、敘事性與程序性的牽制，則較契合軟制衡與不完全制衡的型態。本文後續分析將顯示，2026 年美伊戰爭的經驗證據最接近第三種情境，為「霸權延續但功能弱化」之命題奠定理論對話的基礎。

二、霸權穩定論的操作

為使霸權穩定論具備實證分析能力，本文將論點轉化為四項可觀察的操作指標，分別為「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力」及「制度正當性」。這樣的操作化設計兼顧理論內涵與經驗檢驗的可行性，使抽象理論得以轉化為可供實證操作的檢驗標準。

(一) 盟友配合程度

盟友是否跟進霸權行動是衡量霸權約束力的重要指標之一。Goh (2008) 指出，中小國面對霸權壓力時往往採取「有限追隨」或「避險策略」，而非無條件全面服從。當盟友對霸權的信任程度下降時，政策自主性便會隨之提升，因此削弱霸權整合集體行動的能力。

Ikenberry (2001) 從自由制度主義角度指出，同盟關係的制度化有助於提升盟友合作意願，但前提是霸權行動具備可預測性與正當性，一旦霸權傾向單邊主義，難避免產生盟友疏離的現象。

(二) 對手制衡強度

就現實主義而言，霸權的存在本身會誘發其他國的制衡反應 (Waltz, 1979)。不過，制衡並非必然出現，強度受到權力分布結構與威脅認知的雙重制約 (Waltz, 2000)。Mearsheimer (2014) 指出，在直接對抗成本過高的情況下，國家可能轉而採取「軟制衡」或「有限制衡」策略，以規避正面衝突。

權力轉移理論提供另一解釋視角。Organski 與 Kugler (1980) 強調，當新興強權的能力逐步接近霸權時，衝突風險將隨之升高，但在權力差距仍然懸殊的條件下，制衡行為可能呈現不完全形態。該主張對理解當前中俄對美國戰略的操作頗具解釋力。

(三) 公共財供給能力

公共財供給能力是霸權穩定論的重要主張之一。Kindleberger (1973) 宣稱，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有賴領導者持續提供流動性支持與市場開放。後繼研究在此基礎上將公共財範疇擴展至能源安全、海上航道安全與供應鏈穩定等領域，若霸權無法穩定維繫公共財之供給，領導地位的正當性就會受到質疑 (IEA, 2025; SIPRI, 2025)。

(四) 制度正當性

制度正當性涵蓋兩個相互關聯的條件：規範遵守 (compliance) 與行動正當性 (legitimacy)。Keohane (1984) 主張，國際制度藉由降低資訊成本與協調摩擦促成合作，但成效取決於成員國對規則的遵守程度。Krasner (1983) 揭示，制度穩定與背後權力結構密切相關。Clark (2005) 強調，正當性是霸權影響力得以發揮的關鍵，如果霸權行動被認定違反國際法或既有規範，領導地位便會遭受挑戰。

為提升檢證的確實程度與可否證性，本文進一步界定各指標的判讀基準。就盟友配合程度而言，「維持」係指盟友於基地、空域、海上巡弋或政治論述提供實質配合，「弱化」指盟友僅承認威脅、卻拒絕共同承擔行動成本。就對手制衡

強度而言，「硬制衡」指對手形成具軍事實質的集體抗衡，「軟制衡或不完全制衡」指對手停留於制度、程序與外交層次的牽制。就公共財供給能力而言，判準在於關鍵航道安全與能源穩定能否於霸權介入後實際恢復，抑或反而趨於惡化。就制度正當性而言，判準在於聯合國及相關國際機制能否為霸權行動建立一致的合法性框架，或僅能於事後從事危機補救。

依據上述基準，本文可將分散的事件證據系統化地連結至理論命題，避免流於印象式描述，並提升四項指標評估結果的內在一致性。

三、小 結

根據前述，霸權穩定論已由單一理論演化為多層次之複合分析框架。傳統觀點著重闡明霸權對國際秩序的正面功能，修正觀點則把焦點放在它的限制與不穩定風險。在操作層次，透過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力及制度正當性等四項指標，可對霸權運作的實際效能進行實證評估。該理論架構為分析 2026 年美伊戰爭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使本文得以從權力結構、行為策略與制度規範三個分析層次，交叉檢驗當前國際體系究竟仍維持單極穩定格局，抑或已出現向多中心競逐秩序轉型之明確訊號

參、主要霸權的權力互動

本節依據前述操作設計，檢視「盟友配合程度」與「對手制衡強度」兩項指標。若美國仍能將軍事優勢轉化為同盟跟進與對手退卻，則霸權約束力可視為維持；反之，若盟友普遍採取條件式合作、主要對手僅進行有限度牽制，則意味霸權仍然存在，但動員與約束功能出現弱化。

一、美國盟友的有限追隨

自從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後，美國盟友、聯合國與主要國際組織的回應並未形成完整支持華府的單一路線。戰事爆發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立即呼籲停止敵對行動。3 月 11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 2817 號決議，譴責伊朗對區域鄰國的飛彈與無人機攻擊，惟安理會並未就美國與以色列使用武力建立一致的合法性框架（UN, 2026）。3 月 12 日，美

國及西方盟友與中俄兩國於安理會就伊朗核制裁安排展開言詞交鋒，雙方試圖透過敘事競爭重塑國際體系規範的正當性（Reuters, 2026b）。

歐洲盟友的反應最能反映有限追隨之實質內涵。歐盟在 2 月 28 日與 3 月 9 日的兩次聯合聲明，均強調區域安全、核不擴散與外交降溫的重要性，表明歐洲並未將美國初始軍事打擊視為可無條件擴張的政治授權（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a, 2026b）。3 月 19 日，歐洲理事會固然嚴厲譴責伊朗對區域國家的攻擊，但將重點放在立即停止軍事升高、維護區域主權與落實聯合國決議，一方面批評伊朗後續報復行動，另一方面強調透過外交方式遏止局勢升高（Reuters, 2026a）。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簡稱「北約」）的訊號同樣清楚。北約秘書長呂特（Mark Rutte）在 4 月 9 日演說時指出，若北約在荷姆茲海峽扮演角色，前提必須是盟友能就任務形成共識，他談論的是盟友之間可期待何種合作，而非北約自動承接美國對伊作戰（NATO, 2026）。

換言之，北約並未將此次衝突視為集體防衛的延伸，這說明就算歐洲仍承認伊朗核與飛彈能力對安全的潛在威脅，對美國戰略手段配合也已高度條件化。從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制度化同盟並非無條件服從機制，霸權若欠缺程序正當性與可預測性，同盟內部即可能出現明顯之保留與切割（Ikenberry, 2001; Keohane, 1984）。

4 月 8 日，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達成兩週停火，歐盟對停火表示歡迎，但重點並非擴大對美合作，而是要求各方完全遵守停火、恢復自由航行並盡速進入實質談判（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c, 2026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c）。4 月 13 日，美國在談判失敗後宣布對伊朗港口實施海上封鎖，英、法、德等北約盟友隨即明確表示不參與美國的行動（Reuters, 2026c）。

上述事件具備指標性意義：歐洲並非否定海峽的戰略價值，而是拒絕接受由美國單邊界定目標，再要求盟友追隨的協作模式。對本文而言，這觀察構成理解當前美國與歐洲盟友關係重塑的核心論據。霸權若仍能有效整合集體行動，軍事行動通常可快速獲得盟友在基地、空域、海上巡弋及政治論述的配合，但在美伊戰爭，盟友多半選擇把「承認伊朗威脅」與「拒絕共同參戰」區分處理，正是有限追隨的典型表現（Goh, 2008; Ikenberry, 2001）。

顯然地，歐洲安全自主性已經上升。美國的軍事優勢使歐洲不致於與華府決裂，但歐洲傾向將自身角色定位為危機管理者與停火推動者，而非共同交戰者。就霸權穩定論而言，這代表盟友並未反向制衡霸權，卻也不再願意把霸權的選擇視為自身義務，這將削弱美國藉由同盟進行秩序供給的效率。

與歐洲相較，印太盟友對美國的態度更為謹慎，政策重心聚焦在能源風險、航行安全與經濟減震，而非共同承擔作戰責任。日本於 2 月 28 日率先指出中東局勢對能源安全與國家利益具有重大衝擊，並成立應變機制處理局勢（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a）。4 月 2 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出席由英國主辦之「荷姆茲海峽外長線上會議」，呼籲美伊雙方盡速降溫、保障航路安全與維持國際合作。4 月 8 日，日本加入歡迎兩週停火之聯合聲明，要求各方以外交方式尋求持久安排（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b, 2026c）。日本的政策走向十分清楚：與美國維持協調，但避免將中東戰區軍事化為日本必須直接承擔之義務。

南韓的反應和日本無異。4 月 14 日，南韓總統李在明表示，荷姆茲海峽緊張使全球油價與原材料供應鏈壓力難以迅速緩解，要求政府將長期能源與物流中斷視為既定前提，迅速部署補充預算、支援原油進口並協助滯留在海峽的韓國油輪脫困（Reuters, 2026e）。這說明首爾的優先順序在於「管控經濟衝擊」，而非追隨美國擴大軍事行動。南韓並未公開否定美韓同盟，但也未轉化為對伊朗戰線的實質配合。

4 月 15 日，日本、澳洲等十一國財長在華府發表聯合聲明，要求落實停火協議，並警告若戰事重啟或荷姆茲海峽持續受阻，全球能源安全與供應鏈將承受更大壓力（Reuters, 2026f）。這些國家的聯合聲明並非支持美國升高壓力，而是表達對戰爭成本的共同憂慮，政策模式更接近「協助穩定體系」而非「參與美國作戰」。

因此，印太盟友的表現可概括為戰略觀望：既未脫離美國陣營，也未全面承擔美國在中東的高風險政策選擇，這符合 Goh（2008）的見解：在霸權仍具結構優勢時，盟友不會輕易對抗霸權，但在涉及高成本、非主要戰區之情況下，亦不會無條件追隨。

二、中國的不完全制衡

中國對美國行動的反應，呈現出明確批評與實際克制並存的特徵。3 月 2 日，中國外長王毅與伊朗外長通話，表示中國支持伊朗維護主權、安全、領土完整與國家尊嚴，並要求美國與以色列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防止衝突在中東擴散（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3 月 11 日，中國外交部隨指出，美國與以色列在未獲聯合國授權下對伊朗使用武力，明顯違反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主張各國主權、安全與領土完整應受到尊重（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

就話語層次而言，北京清楚將美國行動定位為單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延伸，試圖以國際法與主權原則削弱正當性。不過，中國的論述並不止於支持伊朗，而更強調停火、止戰與恢復談判。4 月 13 日，王毅與巴基斯坦外長通話時即形容當前停火「非常脆弱」，呼籲國際社會一致反對任何破壞停火或再次升高對抗的舉措（Reuters, 2026d）。亦即，北京雖對美國提出批評，但實際目標仍在防止局勢失控，而非將自己轉化為反美聯盟的主導者。

中國採取策略性克制的理由，首先是直接對抗的成本過高。從地緣戰略而言，中東並非中國可與美國展開高強度軍事競逐的主戰場，北京在該區域的核心利益主要是能源進口、航道安全與區域穩定，而非建立一套可替代美國的軍事安全架構。正因如此，北京在聯合國與外交場合多採取程序性與敘事性的牽制，而未展開軍事層次的實質對抗。3 月 12 日，美國與盟友在安理會推動重啟伊朗制裁相關安排時，中俄試圖阻撓，但最終只是在程序與敘事層面與美國交鋒（Reuters, 2026b）。

若從結構現實主義看待，這是低成本、有限度的軟制衡。當前中美實力差距雖已縮小，但在中東投射能力與區域同盟網絡，美國仍具明顯優勢，在非生存戰區與非直接利害衝突，中國採取「批評而不軍事介入」的模式，符合 Waltz (1979) 與 Mearsheimer (2014) 指出的制衡條件邏輯。北京既不願讓美國完全壟斷中東敘事，也不願為伊朗承擔與美國全面對撞的代價。

其次，中國並未對伊朗提供無條件支持。中國固然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買家，但 4 月 15 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公開警告，若任何國家繼續購買伊朗石油、或允許伊朗資金停留於本國銀行體系，華府將施加次級制裁，美方更點名中國銀行體系可能成為制裁對象（Reuters, 2026h）。在此壓力下，北京反對美國以封鎖與

次級制裁處理伊朗問題，又必須避免自身金融機構與能源企業被捲入直接制裁的風險。

換言之，中國對伊朗的實際態度，並非結盟性的全面支持，而是維持必要關係、反對美國單邊軍事與制裁擴張，並盡量避免自身成為次級交戰方。就權力轉移理論角度，這正是「不完全制衡」：新興強權已具備質疑霸權與牽制霸權之能力，卻仍未具備、或未認為有必要承擔全面抗衡的成本（Organski & Kugler, 1980; 吳玉山, 2017）。

此種模式亦與 Schweller 與 Pu（2011）的觀察相互呼應，亦即在尚未具備全面制衡的條件之前，新興強權傾向先以質疑霸權行動合法性、強調多邊主義與主權原則等「去正當化」手段，逐步累積戰略籌碼，而非貿然進入直接對抗。中國在聯合國以國際法與主權話語牽制美國，並在能源與金融方面維持與伊朗的必要往來，卻同時規避次級制裁的風險，正是此一思維的具體表現。鑑於這個緣故，將中國的反應界定為「不完全制衡」，不但符合權力轉移理論對能力差距的描述，亦與當代關於單極結構下制衡行為的理論辯論相互銜接。

綜言之，中國的策略性克制不應被解讀為對美國的默認，而應理解為在批評霸權、維持與伊朗關係，以及避免直接衝突之間的平衡選擇，這反映當前國際體系雖已不再是美國可暢行無阻的單極高峰，但距離形成由中國主導、能在中東與美國對等競逐的替代秩序，仍有一段路要走。

三、俄羅斯的象徵性制衡

相較於中國的策略性克制，俄羅斯的表態更為直接，也更具反美色彩。2 月 28 日戰事爆發後，俄方旋即批評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之軍事打擊，批評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使用武力的非法性，以及單邊行動對中東穩定造成的衝擊（Reuters, 2026a）。隨後，莫斯科持續透過聯合國程序攻防與外交發言，反對美國將伊朗核問題戰時化與單邊化。

更具代表性的作法出現在伊朗濃縮鈾安排。4 月 15 日，克里姆林宮表示，美國拒絕由俄羅斯接收伊朗濃縮鈾庫存、再轉化為民用核燃料的提案，俄方認為這原本可作為緩和衝突與重啟談判的折衷方案（Reuters, 2026g）。這項提案的政治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效果，它顯示俄羅斯企圖維持自身作為中東與伊核問題重要斡旋者之地位，且藉由提出替代方案，削弱美國對「唯一可行解方」的壟斷。

然而，若就意圖與能力加以區分，俄羅斯在此次衝突的表現，仍更接近象徵性制衡，而非實質制衡。就意圖而言，俄羅斯顯然希望以反對美國單邊行動、在聯合國程序與中國協同，以及提出替代性核安排方案，維持在反美秩序競逐的能見度與政治籌碼。就能力而言，俄羅斯卻未能對伊朗提供具有決定性的軍事支援，也未能形成可在中東與美國直接對峙的安全架構。

就現實主義而言，這說明制衡不僅是意志問題，更是資源與地理投射能力問題 (Waltz, 1979)。俄羅斯固然有對抗美國霸權的動機，但在當前條件下，對伊朗的支援主要侷限於外交聲援、程序牽制及核談判替代方案，仍不足以改變戰場或區域權力分布，也就是說，俄羅斯並非沒有制衡意圖，而是制衡能力難以支撐由意圖轉化為高強度行動。

該現象對本文論點具重要意義：若俄羅斯已具備在中東與美國正面抗衡之能力，則美伊軍事事務將加速多極化成形，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俄羅斯的行為更像是經由外交與程序性資源維持存在感的象徵性制衡，這表示美國雖面臨中俄的挑戰，卻尚未遭遇足以改寫結構格局的外部聯合硬制衡 (Gilpin, 1987; Ikenberry, 2018)。

四、小 結

2026 年美伊戰爭中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不在於美國是否仍具有單獨使用武力的能力，而在於武力能否自動轉化為盟友服從、制度支持與對手退卻。本文的分析顯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歐洲盟友拒絕配合軍事封鎖，印太盟友則以戰略觀望處理衝擊，中國採取策略性克制與不完全制衡，俄羅斯停留於象徵性制衡，這些反應共同指向同一結論：美國霸權仍具顯著結構優勢，但約束力、動員力與正當性資源均已明顯弱化。

不過，這並不等於國際體系已出現清晰的集體制衡或多極替代。盟友沒有轉向對抗美國，中俄亦未形成足以取代美國的制度與安全安排，故就本節而言，較合理的判斷並非「霸權終結」，而是「霸權仍在，但功能性約束力下降」，這也為下一節檢視美國是否仍能有效提供公共財與制度正當性奠定分析基礎。

肆、霸權與國際秩序

第三節討論的重點是「主要行為者如何回應美國」，本節處理的問題是「這場戰爭究竟如何影響霸權所應提供之國際秩序」。依照霸權穩定論，霸權之所以能維持體系穩定，不僅因軍事能力優勢，更因有能力和意願供應關鍵公共財、降低交易不確定性，並以制度與規範維持行動的可預測性（Gilpin, 1987; Kindleberger, 1973）。依此標準來看，2026 年美伊戰爭所展現的，不是美國無力出手，而是軍事行動與後續封鎖造成能源、制度與區域秩序之高度脆弱化。

一、全球能源供給穩定性的脆弱

荷姆茲海峽是全球能源貿易的關鍵戰略通道。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於 2026 年 3 月指出，該海峽平時承載約四分之一的全球海運石油貿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氣與肥料運輸，但自 2 月 28 日衝突爆發後，海峽每日船舶通行量一度驟降近 97%，接近停擺（UNCTAD, 2026a）。這情況說明霸權最基本應提供的公共財（重要航道安全）並未因美國介入而恢復，反而在戰爭與封鎖相互疊加下更為脆弱。

從地理與市場結構看，荷姆茲海峽封鎖的外溢性尤其顯著。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指出，途經該海峽的原油與液化天然氣主要輸往亞洲，價格與供應衝擊卻迅速蔓延至歐洲及其他市場（UNCTAD, 2026a）。4 月 15 日，多國財長聯合聲明警告，若戰事重啟或海峽持續受阻，全球能源安全與供應鏈將面臨更大壓力（Reuters, 2026f）。同日，德國財長亦表示，德國雖未參戰，卻已感受到戰爭對成長與能源成本的拖累（Reuters, 2026i）。這說明美國的中東軍事行動雖有明確戰略目標，卻將全球能源市場置於高度不確定狀態。

此種風險隨即透過價格與運輸成本向全球市場蔓延。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於 4 月 1 日指出，由於荷姆茲海峽運輸受阻，燃料價格高漲且維持高位，全球貿易成長因而面臨下修壓力（UNCTAD, 2026b）。另外，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警示，既有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已難以有效管控當前局勢，導致航運產業鏈從商船運力、船員人身安全至保險金融端的風險閾值均已逼近臨界點（IMO, 2026）。

以上發展具有兩層意涵。第一，市場衝擊並不止於原油現貨價格上升，而是同步拉高運費、船用燃料、戰爭保險與供應鏈融資成本。第二，這些成本不再僅由交戰國承擔，而是外溢為全球性的交易成本上升。依霸權穩定論之邏輯，若霸

權能有效提供公共財，有助於降低國際市場不確定性，但美國雖試圖以封鎖與軍事壓力迫使伊朗讓步，卻也使全球市場進入高波動與高成本狀態，此種結果更接近強制性的「高成本補位」，而非低交易成本的秩序供給（Gilpin, 1987）。

二、國際制度與國際法正當性的削弱

2026 年美伊戰爭另一個重要後果，是聯合國與國際法正當性受到侵蝕。2 月 28 日衝突爆發後，聯合國秘書長公開呼籲立即停止敵對行動與恢復談判，這一表態並未為美國軍事行動提供明確正當化，而是將其納入「整體軍事升高」的負面框架（Reuters, 2026a）。3 月 11 日安理會通過第 2817 號決議，譴責伊朗對區域鄰國的攻擊，固然顯示聯合國仍能在部分議題形成決議，但該決議並未解決最初對伊朗動武的合法性爭議（UN, 2026）。

3 月 12 日，美國在安理會將伊朗核問題與軍事行動正當化緊密連結，與中國、俄羅斯進程序與敘事攻防。這說明聯合國制度並未構成對強權用武的約束，而更多是在戰爭爆發後成為危機管理與合法性爭論的場域（Reuters, 2026b）。從 Clark（2005）的視角，霸權要維持領導地位，必須獲得國際社會對行動之認可，但當主要的制度或機構無法提供穩固的正當性基礎時，霸權的制度性資源便會相對耗損。

核不擴散體制的情況亦相當類似。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署長格羅西（Rafael Grossi）在 3 月 2 日特別會期與理事會發言，將伊朗與中東局勢形容為「極為嚴重」，並明言必須處理最近軍事打擊後伊朗核計畫的安全與查核問題（IAEA, 2026a）。2 月 27 日公布之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告顯示，伊朗對部分核材料與設施資訊之申報仍存在缺口，技術討論需於 3 月初繼續推進（IAEA, 2026b）。

表面看，這似乎可支持美國對伊朗核威脅的疑慮，但從制度功能角度觀之，問題恰在於當核爭議被重新軍事化後，國際原子能總署查核與《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規範的作用便被迫退居次位。換言之，美國固然以削弱伊朗核能力為戰爭理由之一，軍事行動卻也使得核設施安全、資料透明與持續監測更難以維持。制度原本應扮演的是「先行約束與查核」角色，卻被迫轉化為戰後補救與危機追認機制。正如 Keohane（1984）

與 Krasner (1983) 提醒：若是主要強權以單邊方式處理制度性爭端，制度的可預測性與正當性便會受到侵蝕。

三、中東區域秩序的重組

從區域層次觀察，美伊戰爭帶來某種重組效果。歐盟領導人在 4 月中旬訪問波灣國家後表示，部分國家遭受「不正當攻擊」，並重申必須遏止伊朗支持之區域代理人網絡，尤其是真主黨對黎巴嫩與周邊秩序造成的不穩定作用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e)。這反映在許多區域與域外行為者眼中，伊朗仍被視為中東不穩定的重要來源，美國軍事打擊在短期內確有促使部分國家再度建構安全認知共識之效果。

然而，這種重組並非建立在廣泛制度共識，而是建立在戰時威懾、封鎖與外部斡旋之上，也就是說，區域秩序的重組目前更接近「強制性再配置」而非「制度性整合」。波灣國家、歐洲與印太盟友多數希望壓制伊朗，但也希望盡快停火、恢復通航，並避免被捲入長期軍事對抗，這使得美國雖能在短期內重塑若干安全依賴，卻未能將之轉化為穩定而低爭議的區域治理安排 (Ikenberry, 2001)。

四、外溢效應

美國為維持對伊朗的軍事與經濟壓力，不僅於 4 月 13 日啟動對伊朗港口之封鎖，亦於 4 月 15 日宣告對伊朗石油買家與協助伊朗資金流動之外國銀行施加次級制裁 (Reuters, 2026c, 2026h)，這說明美國雖然仍具備整合軍事、海權與金融制裁工具的能力，也必須在中東長時間維持高成本投入，方能支撐此戰略。

對霸權穩定論而言，重點不僅在於霸權「能否出手」，更在於霸權「是否能以可持續成本出手」，若每次秩序維護都必須伴隨更高的海軍部署、能源外交、制裁執法與盟友協調成本，則秩序供給功能即使尚未崩潰，也將呈現邊際遞減。Gilpin (1987) 指出，霸權衰退往往不是突發式崩解，而是維持秩序成本不斷上升、收益相對下降的過程。2026 年美伊衝突為前述論點提供具說服力的實證觀察。

此外，本案亦暴露出霸權嚇阻可信度的雙面性。一方面，美國展示可快速打擊伊朗、施加封鎖並動員金融制裁的能力，敵手無法忽視美國的軍事優勢。另方

面，盟友拒絕共同承擔戰事、聯合國未能提供正當性框架、停火反覆脆弱，意味美國傳遞出的訊號更接近「有能力單獨施壓」，而非「有能力獲得廣泛認可地穩定秩序」。

這個差異對霸權穩定論極為重要。威懾能力並不自動等於秩序供給能力，前者可以依賴武力，後者卻需要制度、盟友與正當性共同支持(Clark, 2005; Ikenberry, 2018)。當霸權的軍事可信度與制度可信度脫鉤時，領導便會出現層次分裂，對手仍敬畏武力，盟友卻保留合作，制度則不再自動背書，這正是當前美國霸權面臨的主要困境。

五、小 結

總括而言，2026 年美伊戰爭對國際秩序之衝擊可歸納為三點。第一，高成本：能源、運輸、保險、軍事部署與金融制裁執法等成本均顯著上升。第二，低正當性：聯合國未能對初始用武建立一致合法性框架，國際制度僅能扮演事後控管與補救角色。第三，高外溢風險：荷姆茲海峽、糧食與肥料價格、區域代理人衝突，以及全球供應鏈皆持續承受壓力。

因此，本個案呈現的結果並非「霸權崩潰」，而是「霸權仍可施壓，但已難以低成本、低爭議地提供秩序」，這結果與修正後的霸權穩定論相符—霸權延續，功能弱化。

伍、結 論

本文以 2026 年美伊戰爭為單一個案，從盟友配合、對手制衡、公共財供給及制度正當性四個面向，檢驗霸權穩定論在當前國際體系的解釋力，研究結果顯示，就目前情況而言，戰爭並未觸發全球權力結構的根本轉變。就權力面而言，美國仍是唯一能在短時間內對伊朗施加高強度軍事、金融與海上壓力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雖有所回應，但均未形成足以取代美國的集體制衡聯盟。基此，本文否定「多極化已取代單極體系」之說法，而較接近「單極延續，但運作條件弱化」的見解。

就行為面而言，盟友對美國的服從程度下滑，但尚未轉向對抗。歐洲盟友拒絕共同參戰，印太盟友則把政策焦點放在航道安全、能源避險與外交降溫，但這些國家並未站到伊朗或中俄一側，這彰顯同盟關係並未瓦解，而是從過去較高程

度的戰略跟隨，轉向更具條件性、議題化與成本計算的合作模式。Goh (2008) 提到的「有限追隨」與避險邏輯，比傳統「盟友服從霸權」的假定，更能掌握此次戰爭的同盟互動。

就制度面而言，戰爭暴露出美國秩序供給功能的式微。能源安全與海上通行是霸權應提供的關鍵公共財，但荷姆茲海峽在戰事期間接近停擺，全球油價、保險與運輸成本同步上升，聯合國未能在衝突初始階段約束強權用武，僅能在風險控管與有限查核發揮補位作用。這顯示美國依然可利用軍事優勢重塑區域局勢，卻難以維持低成本、高正當性與可制度化的秩序供給。

綜合上述，本文支持「霸權延續但功能弱化」的修正型霸權穩定論，但領導方式已更加依賴強制性工具，且較難透過同盟體系與國際制度實現自發性延伸。此論點說明，當前國際體系並非單純從單極轉向多極，而是處於霸權延續、盟友保留、對手有限牽制，以及制度效能衰退並存的狀態。

對美國而言，若要延續領導地位，必須降低單邊軍事行動對制度與盟友信任的侵蝕成本，若每次危機處理都需依賴更高強度的軍事施壓，而無法轉化為較廣泛的政治認可，則美國雖仍能夠於戰術層面勝出，卻將在戰略層面承受更高的領導成本。

對盟友而言，個案彰顯策略自主性的重要。歐洲與印太盟友並未否認伊朗對區域安全的威脅，也未放棄與美國合作，但它們更明確地將「與美國協調」與「為美國承擔戰爭成本」區分開來，往後同盟政治恐將更傾向條件式合作，而非高度服從。

對國際制度而言，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制度是否存在，而是正當性如何修復。若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只能在衝突爆發後從事有限補救，無法在衝突前有效約束強權，則制度雖未消失，權威將持續遞減。如何回復制度之可預測性與可信度，將是美伊戰後秩序重建的重大議題。

本文有兩項研究限制：其一，本文採單一個案研究設計，雖有助於深入檢驗理論，但仍須與其他危機案例對照，方能確認「功能弱化的霸權延續」是否具有更強的一般化解釋力。其二，美伊戰後的局勢仍屬脆弱狀態，荷姆茲海峽通行、伊朗核安排，以及美國國內戰爭授權問題，均尚未完全定型。因此，本文應被理解為對戰爭初期與中期效果的理論檢驗，而非對最終結果的定論。

惟須強調，本文的推論係建立於行為與過程層次的可觀察證據，包括各國的官方聲明、國際組織決議與市場數據，而非對戰爭最終結果的臆測，儘管衝突仍在演進，這些既成事實已足以支撐對霸權運作效能的階段性評估。換言之，本文檢驗的是霸權「如何運作」與「運作成效如何」，而非戰爭「將如何收場」，兩者屬不同層次的問題。未來的研究若能延長觀察週期並擴大對照組樣本量，將有助於進一步驗證本文結論的穩健性與普適性。

後續研究可朝三個方向延伸。第一，持續追蹤停火是否制度化，以及美伊是否重新回到具有可驗證的核安排。第二，比較美國盟友在類似危機的政策選擇，以深化對有限追隨與策略自主的理解。第三，檢視中國與俄羅斯未來是否會從「不完全制衡」與「象徵性制衡」轉向更高強度的聯合抗衡。若發生以上轉變，對國際體系由單極穩定轉向多中心競逐之判斷，將具有更充分的經驗證據。

參考文獻

- 包宗和 (2011)。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與挑戰。《政治科學論叢》，(48)，1–32。[Pao, T. H. (2011).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8), 1–32.]
- 宋學文 (200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問題與研究》，43 (2)，171–196。[Sung, H. W. (2004). An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vel of analysis. *Issues & Studies*, 43(2), 171–196.]
- 吳玉山 (2017)。權力轉移理論與國際關係。《問題與研究》，56 (1)，1–30。[Wu, Y. S. (2017).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56(1), 1–30.]
- 施正鋒 (2021)。《國際關係理論》。翰蘆出版社。[Shih, C. F. (202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anlu Publications.]
- 鄭端耀 (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 (2)，1–21。[Cheng, T. Y. (2003). An assessment of the debate betwee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sues & Studies*, 42(2), 1–21.]

- Brooks, S. G., & Wohlforth, W. C. (2005).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72–108.
- Brooks, S. G., & Wohlforth, W. C. (2008).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I. (2005).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a).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Costa and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developments in Ira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6/02/28/joint-statement-by-president-costa-and-president-von-der-leyen-on-developments-in-iran/>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b).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Costa and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fter the video conference with leaders from Middle East countries on the war in Ira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6/03/09/joint-statement-by-president-costa-and-president-von-der-leyen-after-the-video-conference-with-leaders-from-middle-east-countries-on-the-war-in-iran/>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c). Leaders' statement on the two-week ceasefire conclud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6/04/08/leaders-statement-on-the-two-week-ceasefire-concluded-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iran/>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d). Statement by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n behalf of the EU on the ceasefire agre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6/04/09/statement-by-the-high-representative-on-behalf-of-the-eu-on-the-ceasefire-agreed-by-the-united-states-and-iran/>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e). Press remarks by President António Costa following the visit to United Arab Emirates, Saudi Arabia and Qatar.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6/04/15/press-remarks-by-president-antonio-costa-following-the-visit-to-united-arab-emirates-saudi-arabia-and-qatar/>
- George, A. L., & Bennett, A.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T Press.

- Gerring, J. (2007).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h, E. (2008).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3), 113–157.
- Ikenberry, G. J.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 (2018).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1), 7–23.
-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2024). *Verification and monitoring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 light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31 (2015)*.
-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2026a). IAEA director general’s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statements/iaea-director-generals-introductory-statement-to-the-special-session-of-the-board-of-governors>
-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2026b). *NPT safeguards agreement with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GOV/2026/8)*.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gov2026-8.pdf>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5). *Oil market report*.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2026). Fragmented responses are no longer sufficient: IMO secretary-general.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PressBriefings/pages/Fragmented-responses-are-no-longer-sufficient-IMO-SG-Strait-of-Hormuz.aspx>
- Keohane, R.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 P.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rasner, S. 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authammer, C. (1990/1991).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1), 23–33.
- Layne, C.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4), 5–51.

- Lieber, K. A., & Alexander, G.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109–139.
- Lijphart, A.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3), 682–693.
- Mearsheimer, J. J.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 W. W. Norton & Company.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a).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ttps://www.mofa.go.jp/me_a/me2/pageite_000001_01504.html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b). Online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ite_000001_02240.html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c).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ttps://www.mofa.go.jp/me_a/me2/pageite_000001_01572.html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uo Jiakun'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March 11, 2026. https://www.mfa.gov.cn/eng/xw/fyrbt/202603/t20260311_11873028.html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6).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Mark Rutte. <https://www.nato.int/en/news-and-events/events/transcripts/2026/04/09/speech-by-nato-secretary-general-mark-rutte-at-the-reagan-institutes-center-for-peace-through-strength>
- Organski, A. F. K., & Kugler, J. (1980). *The war ledg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pe, R. A.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7–45.
- Paul, T. 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46–71.
- Reuters. (2026a, February 28). Global reaction to U.S., Israeli attacks on Iran.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global-reaction-israeli-us-attacks-iran-2026-02-28/>
- Reuters. (2026b, March 12). U.S. and allies clash with Russia and China at UN over Iran nuclear progra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allies-clash-with-russia-china-over-iran-nuclear-program-2026-03-12/>
- Reuters. (2026c, April 13). NATO allies refuse to join Trump's Iranian port blockade.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nato-allies-refuse-join-trumps-strait->

hormuz-blockade-2026-04-13/

Reuters. (2026d, April 13). China calls U.S.-Iran ceasefire “very fragile,” urges unified opposition to escalation.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calls-us-iran-ceasefire-very-fragile-urges-unified-opposition-escalation-2026-04-13/>

Reuters. (2026e, April 14). South Korea’s Lee warns Iran war to keep oil price high, orders quick aid rollout.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outh-koreas-lee-warns-middle-east-conflict-keep-oil-price-high-orders-quick-aid-2026-04-14/>

Reuters. (2026f, April 15). Finance ministers, stung by hit to economies, call for full Iran war ceasefire.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finance-ministers-warn-prolonged-market-impact-middle-east-conflict-2026-04-15/>

Reuters. (2026g, April 15). Kremlin says U.S. has rejected its proposal that Russia take Iranian uranium stock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kremlin-says-us-has-rejected-its-proposal-that-russia-take-iranian-uranium-2026-04-15/>

Reuters. (2026h, April 15). U.S. warns that buyers of Iranian oil could be hit with sanction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us-targets-irans-oil-transportation-infrastructure-with-sanctions-2026-04-15/>

Reuters. (2026i, April 15). Germany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e Iran war, but it is feeling its effects, finance minister says.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germany-is-not-taking-part-iran-war-it-is-feeling-its-effects-finance-minister-2026-04-15/>

Schweller, R. L., & Pu, X. (2011).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1), 41–72.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 Chinese FM says supports Iran in safeguarding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202603/03/content_WS69a635c2c6d00ca5f9a0971e.html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5). *SIPRI Yearbook 2025: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26a). *Strait of Hormuz disrupt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osgtinf2026d1_en.pdf

-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26b). *Strait of Hormuz disruptions: Growth and financial implications*.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osginf2026d2_en.pdf
- United Nations. (2026). Security Council adopts Resolution 2817 (2026) condemning Iran's "egregious attacks" against neighbours as Middle East violence rapidly escalates. <https://press.un.org/en/2026/sc16315.doc.htm>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 Waltz, K.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5–41.
- Wohlforth, W.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1), 5–41.

The 2026 U.S.–Iran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Hegemony: A Reexamination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William 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joint military strike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in February 2026 and its ensuing regional and global consequences as a single case study to asses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T)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Using HST as the prim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supplemented by Structural Realism,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this study operationaliz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into four indicators: the degree of allied compliance, the intensity of adversarial balancing, the capacity to supply public goods,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United States retains structural advantages in both military and institutional domains, and no immediately viable multipolar order has emerged to replace it;

European and Indo-Pacific allies have adopted limited alignment and strategic hedging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ing a decline in hegemonic binding capacity over allied behavior;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criticized American military actions, yet the former has primarily engaged in incomplete balancing while the latter has resorted to symbolic balancing, with neither forming a collective hard-balancing coalition; while the war has intensified direct American pressure on Iran, it has simultaneously undermined the operational viability of navig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n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2026 U.S.–Iran War reveals not the termination of American hegemony, but rather a revised HST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zed by "hegemonic continuity with functional attenuation." This finding carri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jectory of adjustments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Keywords: US-Iran wa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limited alignment, incomplete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order

*William Yang receiv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and is currently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He has previously served as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an of Public Affairs, and Chair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Global Governa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ocial Science. Email: william@mail.shu.edu.tw.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May 31, 2026.